

完善机制 丰富手段

提高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水平

□ 石智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构建方式更加灵活、资源更加丰富、学习更加便捷的终身学习体系。”这为我国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这一战略部署体现了我们党对教育发展规律和人力资本开发规律的深刻把握。我们要将满足人民学习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将人民的终身学习潜能转化为源源不断的人才红利。

提高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水平，是适应人口结构转型、实现人力资本持续开发的迫切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当前，我国正经历深刻的人口结构转型，依赖人口数量扩张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国家竞争力日益取决于人力资本质量。亟须通过提高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水平，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深刻改变知识生产、传播与获取方式，推动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学习方式发生历史性变革。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能够利用技术赋能，构建灵活开放、智慧便捷的学习生态，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本基础。人的发展具有无限潜力和多维需求，并非局限于人生某一阶段。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有助于满足个体在不同生命阶段对知识更新、技能提升、精神丰富的需求，从而提升国民整体素质、涵养社会文明风尚。

强化顶层设计，完善终身学习的制度与法治保障。制度是管根本、管长远的。坚实的法治保障能够为终身学习体系提供稳定预期和刚性约束，确保各类主体责任清晰、资源配置有据可依、学习成果获得社会认可。应加快终身教育立法进程，推动形成国家法律、地方条例、部

门规章相互衔接的法规体系。积极推动地方立法与实践创新，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将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评估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与年度民生实事项目，形成上下联动、层层落实的工作格局。进一步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学习经费补贴、学习成果与职业发展挂钩等制度，强化制度的可操作性与可持续性。

瞄准多样需求，推动学习资源精准供给与公平配置。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必须着力破解学习资源供给侧结构性矛盾，更加精准满足群众学习需求。精准供给与公平配置，是提升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可及性、缩小群体间学习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路径。实践中，一些地区已探索出较为有效的做法。比如，江苏深化“江苏工匠”培育工程，推行“学历+技能”贯通培养模式，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上海推进“老年大学倍增计划”，扩大老年教育供给，并注重老年教育资源向基层倾斜；等等。要着力缩小区域、城乡、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发展公益项目等方式，促进优质学习资源向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脱贫地区倾斜，确保终身学习公共服务覆盖全民。

创新服务模式，拓展学习服务的支持模式与空间载体。可持续的投入与泛在化的场景是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体系充满活力、触手可及的现实保障。可探索建立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投入机制。比如，广东设立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实施差异化补贴标准，助力培养更多适应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的高技能人才。可探索“企业部分培训经费税前扣除+培训补贴”的组合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根据自身实际出台激励措施，激发经营主体投入职工培训的内生动力。在服务模式上，推动学习场所从传统学校向社区、企业、家庭及虚拟空间延伸。因地制宜建设社区学习中心、职工书屋、青年夜校等，推广移动学习、虚拟实训等灵活模式，使学

习深度融入日常生活与工作实践。比如，浙江杭州、湖南长沙、湖北武汉等多个城市开设青年夜校，不断完善青年夜校的服务供给，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加速下沉。

搭建公共平台，畅通学习成果认证和转换渠道。建立全国统一、权责清晰、科学规范的学习成果认证、积累与转换公共服务平台，是激发全民学习内生动力的关键举措。推动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可构建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学习成果认证为重点的终身学习制度。探索在国家层面建立完善学习成果认证、积累与转换制度，研究制定涵盖学历教育、职业培训、社区学习、在线课程等多元化学习成果认定标准与转换规则。打造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功能集成、数据互通，提供成果登记、存储核验、学分查询、转换申请、证明出具等全流程线上服务，确保信息不可篡改、过程透明可溯。探索建立将个人终身学习积分与信用评价、职业发展等适度挂钩的激励机制，鼓励全民终身学习。

深化数字赋能，为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凝聚强大合力。数字技术是重塑学习形态、提升服务效能的革命性力量。要依托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继续探索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建强用好国家终身教育智慧教育平台。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开发个性化学习推荐系统，为学习者规划路径、推送资源、评估效果，实现因材施教。加强数字学习资源开放共享机制建设。强化政府统筹协调能力，搭建政校企合作平台，推动优质数字学习资源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流动与共享。积极引导企业深度参与资源开发和人才培养，形成多方主体协同推进的良好格局。培育扶持相关社会组织与志愿服务力量。组织志愿者有针对性地开展多种学习活动，助力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转自 2026年5月6日《人民日报》)

文化记忆与家国书写：

驻马店红色文化的历史叙事与时代转化

□ 姚志松

文化记忆，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精神纽带，它通过仪式、符号与文本的反复铭刻，将分散的个体记忆升华为超越个体的集体认同。驻马店属于大别山革命老区，是中国共产党在河南开展革命活动、建立党组织较早的地区之一。目前全市物质类红色资源达253处，非物质类红色资源800余件，涵盖革命遗址、烈士故居、纪念馆、革命故事、歌谣、口述历史、民间传说、传统技艺等类型。这片土地既见证了1927年确山暴动中建立河南首个县级人民革命政权的时刻，也承载了竹沟作为“小延安”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枢纽地位，更孕育了杨靖宇将军的英雄气节。

然而，红色文化记忆的传承从来不是自然的延续，而是一场持续的意义再生产。在代际更迭与媒介变革的双重背景下，如何让尘封的红色记忆重新嵌入当代人的精神世界，让家国情怀在历史叙事与时代语境之间实现有效转化，成为驻马店红色文化研究中亟待回应的理论命题与实践课题。

遗址为基：记忆场域的物质承载

文化记忆的首要前提是物质载体。革命遗址、纪念馆、烈士故居等物质性存在，构成了红色记忆得以锚定的“记忆场域”。驻马店境内遍布的253处革命遗址既是历史的沉默见证者，也是记忆的能动塑造者。物质载体的“在场”，使得抽象的历史叙事获得了可触可感的形式。濒危史料的物质性转译构成了精神传承的基础环节，它通过对历史信息的抢救性修复，将脆弱的记忆从濒临消失的边缘“拉回”公共视野之中。

从记忆理论的视角来看，物质遗址不仅是被动的历史容器，更是一种主动的“记忆装置”。当参观者步入竹沟革命纪念馆，目光触及刘少奇、李先念等革命先辈使用过的物件，历史的间距离感，在身体的在场与感官的激活中被不断拉近。物质记忆的脆弱性也提醒我们，记忆场域的维护与修缮，绝非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关乎国家记忆完整性的文化政治。唯有筑牢物质之基，红色文化记忆的家国书写才有坚实的地基。

符号为桥：精神图谱的叙事建构

如果说遗址是记忆的骨骼，那么符号与叙事则是记忆的血肉。从历史事件到文化符号的转化，是红色记忆从“地方性经验”升华为“普遍性价值”的关键环节。驻马店作为大别山革命老区全域覆盖区域，红色底蕴厚重、精神谱系鲜

明。其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集中体现为杨靖宇精神、竹沟精神、大别山精神。

杨靖宇精神是驻马店红色文化最具标识度的精神旗帜，核心是赤诚报国、血战到底的爱国情怀与钢铁革命意志。他用生命践行“驱除外敌、平靖宇内”的誓言。这种宁死不屈、以身许国、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超越地域与时空，成为中华民族不屈脊梁的象征。竹沟精神是驻马店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核心是坚守信仰、育才兴党、高效的组织动员能力，抗战时期，彰显了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凝心聚力、勇担使命的根据地品格，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力、动员力与执行力，是驻马店红色文化中“实干兴邦、组织强基”的精神内核。大别山精神是驻马店红色文化的根基底色，核心是百折不挠、不畏艰险、甘于奉献、勇于牺牲的革命品格。大别山精神蕴含坚守信念、胸怀全局、团结一心、勇当前锋的内涵，是驻马店红色文化中“攻坚克难、矢志不渝”的精神源头，支撑着老区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各时期奋勇向前。

三种精神同向、有机统一，共同服务于家国书写的红色叙事主线。杨靖宇精神立起民族气节与爱国奉献的价值标杆，是精神之魂；竹沟精神彰显组织力与担当实干的实践品格，是行动之基；大别山精神铸就坚韧不屈与牺牲奉献的意志品质，是力量之源。三者从爱国情怀、组织担当、奋斗品格三个维度互补交融，完整呈现驻马店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以国家为念、以人民为本、以信仰为魂、以奋斗为要。这一精神主干，既是驻马店革命历史的凝练升华，也是新时代赓续红色血脉、赋能地方发展、凝聚精神力量的核心支撑。

在当代传播语境中，红色符号的叙事建构不能止步于静态的展示与单向的宣讲，而需要在视觉传播、数字叙事、沉浸体验等多重媒介形态中不断进行“转译”。正如学者指出的，从濒危史料的物质性转译到视觉符号的集体记忆编码，精神谱系的叙事话语正是在不断适应受众认知规律的调整中获得生命力。

认同为核：家国情怀的身份凝聚

文化记忆的终极指向是身份认同。红色文化之所以能够超越地域边界、穿越代际更迭，根本原因在于它回应了一个根本性追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驻马店红色文化所承载的家国叙事，正是通过将个体生命与民族命运、地方经验与国家历史交织在一起，实现了从“历史记忆”到“价值共识”的认同转化。

这种认同凝聚至少存在三个层次。其一是地方认同。对于驻马店民众而言，杨靖宇故居

不仅是一个纪念馆，更是“家乡英雄”的情感锚点，地方感与英雄叙事在此深度耦合。其二是民族认同。杨靖宇在东北林海雪原中孤身奋战，将个体抉择升华为中华民族不屈脊梁的集体象征。其三是政党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竹沟作为中共中央中原局所在地，其“小延安”之誉本身就标志着地方革命史与国家革命叙事的同构。纪念馆教育的具身实践在此扮演了关键角色。当党员干部在竹沟革命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时，当青年在郑立钊烈士生平事迹展览馆的“代笔信”互动区写下“爷爷我想你”，红色记忆便在具身化的情感参与中完成代际传递。

时代为用：红色基因的当代转化

记忆不是朝向过去的单向凝视，而是向着未来的意义激活。驻马店红色文化的时代转化，需要在保护与开发、传承与创新、地方性与普遍性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当前，竹沟革命纪念馆创成国家4A级景区，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提质升级成效显著，但转化之路仍面临深层张力：一方面，红色旅游专业规划不足、内容重叠、互动性匮乏等问题突出；另一方面，数字媒介在提升传播效能的同时，也带来核心价值被稀释的风险。时代转化可从三方面发力。其一，叙事“活化”。确山县“革命遗址再现文明实践项目”，通过“专家+志愿者”守护队和“七步工作法”，将18处濒危遗址打造成“行走的思政课”，为保护与利用并重提供实践范本。其二，技术“赋能”。依托数字化手段构建红色文化数字保护体系与大数据平台，推动红色文化体验从“可看”向“可感”“可交互”升级。其三，产业“融合”。促进红色文化与生态旅游、历史文化、乡村特色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基因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形成可持续“造血”能力。

红色文化的时代转化，本质是从“遗产保护”到“意义再生产”的系统工程，需要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探索红色基因与当代生活的连接点。从遗址修缮到符号转译，从认同凝聚到转化实践，驻马店的探索勾勒出清晰脉络：记忆以遗址为基扎根，以符号为桥流动，以认同为核凝聚，以时代为用焕新。这四重维度层层递进，回答了红色文化在现代化浪潮中“何以存活”“何以焕活”的核心命题。

实践证明，红色文化的生命力不在于静态陈列，而在于被不断讲述、体验与转化。驻马店要持续推动红色基因与时代宏音同频共振，让家国书写的篇章不断延伸，让红色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耀眼的光芒。

(作者系驻马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授)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将“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与“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这两大战略任务置于国家发展的全局高度进行一体谋划、系统推进。这并非简单的政策并列，而是深刻揭示了区域之“协”与乡村之“兴”之间的内在统一逻辑。深入推动两大战略深度融合，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夯实中国式现代化根基意义重大。

深刻把握两大战略深度融合的战略意义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战略深度融合，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应对时代挑战的必然选择，其根植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一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而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是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跨越的结构性障碍。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着力破解的是发展不平衡问题，通过塑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体系，为整体发展构筑骨架；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则聚焦于解决发展不充分矛盾，通过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全局发展夯实根基。两大战略虽各有侧重，但其根本目标高度统一，共同服务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核心宗旨，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体两面。

二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必然要求。区域与乡村绝非割裂的单元，而是命运与共的发展共同体。可以说，没有区域的协同共进，乡村振兴就如同无水之源，缺乏广阔的市场腹地、高效的要素支撑和强大的辐射能力。反之，没有乡村的繁荣稳固，区域协调发展就会失去安全基石和内需潜力，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也将因此失衡。两者的深度融合，正是打破这种相互制约的局面、催生“1+1>2”的聚合效应、筑牢现代化根基的“固本之举”。

三是推动发展范式转变的必然要求。深度融合意味着对传统发展思维的革新。这要求我们要跳出“就城市论城市、就乡村论乡村”的传统思维定式，将乡村问题从单一的“三农”领域，提升到国家宏观战略布局与国土空间规划中通盘考量，通过制度创新与政策协同，推动城乡两大板块在功能上互补、在要素上对流、在价值上共享，推动城乡从“二元分立”走向“有机一体”。

准确把握深度融合的关键支撑

两大战略的深度融合，离不开县域枢纽与城乡循环这两大关键支撑。

县域是深度融合的关键枢纽。县域作为“城尾乡头”，构成了这两大战略叠加赋能、交汇落地的关键枢纽，是城乡要素跨界配置、产业协同发展、社会融合互通的关键节点。《建议》创造性提出要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叠加效应”，而这一效应能否从蓝图变为现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县域这个基本单元能否有效承接重大生产力布局，能否提升综合承载能力以促进城乡人口有序流动与安居乐业。这要求县域发展必须摆脱“小而全”或被动承接淘汰产业的旧思路，主动在更大的区域分工中寻找定位。例如，中心城市周边的县域应发展配套产业和现代都市农业，粮食主产区的县域要聚焦于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与产业链价值，生态功能区的县域则重在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因此，做强做优县域经济，提升其作为资源整合平台、产业承载高地和公共服务供给中心的核心功能，是打通两大战略、催生聚合效应的战略支点。

城乡经济循环是深度融合的重要渠道。县域作为关键载体，为战略落地提供了空间基础，而两大战略的深度融合，更深植于健康、可持续的城乡经济循环之中。一方面区域协调发展通过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和现代化的基础设施网络，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减少了流通壁垒，为乡村持续引入其发展所亟需的资本、技术、人才和数据等现代生产要素，同时为乡村的丰富物产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广袤乡村绝非被动接受的“洼地”，通过提供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优质的生态产品、独特的文化产品以及丰富的人力资源，为国家发展大局承担着保障安全、涵养生态、传承文明、稳定社会的战略性、基础性功能。这种基于比较优势形成的“要素下乡”与“价值进城”，构成了新时代城乡经济循环的核心脉络。推动两大战略深度融合，本质就是要让这一循环更加畅通无阻，让价值交换更加充分有效，从而全面提升国民经济的韧性、安全性与发展的可持续性。

清醒认识深度融合面临的现实挑战

当前，在推动两大战略融合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现实问题。例如，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乡村之间发展差距依然存在，粮食主产区、生态功能区的发展动力与利益补偿机制有待强化，“产粮大县、财政穷县”现象尚未根本扭转。乡村产业与区域产业集群、创新链的衔接有待提升，一些地方的特色产业存在“小、散、弱”问题，产业链短、附加值偏低。此外，人才、资金等要素下乡仍面临诸多堵点，农村资源市场化盘活渠道有待拓宽，基层治理能力与发展任务之间的适配性也需增强，部分县域和乡村的治理水平难以承载战略落地的现实需要。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更深层次的融合、更大力度的改革来解决。

系统构建深度融合的实施路径

面向“十五五”及更长远未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深度融合，必须精准聚焦、协同发力，在关键领域构建起清晰的实施路径。

一是优化空间布局，实施差异化策略。摒弃“千村一面”的思维，基于主体功能定位，引导城市化地区、粮食主产区、生态功能区的乡村各展其长、各得其所，形成疏密有致、功能互补的城乡发展格局。

二是深化产业协作，提升县域经济能级。着力推动县域经济深度嵌入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乡村特色产业全链条升级与“农业+”深度融合，特别是要利用数字技术赋能传统农业和乡村服务业，并充分利用现代流通体系发展智慧物流、农村电商等新业态。关键是要在县域培育一批“链主”型企业或产业化联合体，使其成为连接小农户与大市场、衔接初级生产与精深加工、融合农业生产与休闲服务的核心枢纽，提升乡村产业的组织化程度和抗风险能力。同时，要借助大城市等的技术和市场优势，引导乡村产业主动融入区域产业链分工，发展“总部+基地”“研发+生产”“体验+加工”等新型产业合作模式。

三是创新要素配置，破除双向流动壁垒。深化农村土地制度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激活沉睡资源，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创新人才政策，在创业扶持、公共服务等方面综合施策，吸引并留住“新农人”。强化金融科技支撑，发展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有投入农业农村。探索建立柔性引才育才机制和适应农业农村特点的信贷抵押模式、风险分担机制，破解长期制约乡村发展的要素瓶颈。

四是强化机制保障，形成政策合力。积极探索跨区域的产业协作与利益平衡机制，完善差异化绩效评价与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增强各类宏观政策一致性，形成强大的制度合力，确保融合发展的目标落到实处。另外，要强化基层党组织在统筹区域与乡村发展中的作用，提升其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使之成为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协调多元利益、凝聚发展共识的坚强战斗堡垒。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深度融合，是一项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的系统工程，必须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全国一盘棋的战略思维，用好深化改革关键一招，紧紧扭住县域这个重要载体，有效打通城乡经济循环的堵点，充分释放乡村蕴藏的巨大需求潜力、生态价值与文化底蕴，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绘就一幅城乡区域共同繁荣、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壮丽新画卷。

(作者单位：中共驻马店市委党校)